



革命回忆录

红色医生的摇篮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革命回忆录 ·

红色医生的摇篮

沈阳医学院校史编纂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年·沈

目 录

繼承和发揚革命傳統·····	賀 誠 (1)
中国工农紅軍卫生學校在瑞金·····	孙 儀 之 (5)
在紅軍卫生學校第一期·····	張 汝 光 (12)
茶岭二三事·····	刘 建 水 (19)
在长征的路上·····	吳 行 敏 (22)
过草地的时候·····	李 朝 选 (29)
印講义的故事·····	周 澤 藻 (35)
紅軍卫生工作散記·····	周 玉 明 (37)
从康家沟到閭店子·····	江佳旺、朱廷仕、李振智、王芝元 (45)
紅軍卫生學校的回忆·····	許 德 (51)
战地卫生兵·····	靳 来 川 (55)

在动荡中学习.....	罗洪端 (61)
延河記事.....	史书翰 (68)
大后方採購杂記.....	薛公諱 (79)
大生产运动前后.....	夏朝安 (85)
毛主席的教导.....	王学礼 (94)
文艺花开.....	葛正达 (98)
忆医大十周年展覽会.....	葛正达 (103)
革命的医生.....	黄树则 (107)
在柳树店.....	任国祥 (124)
延安中国医大的片断.....	曲正 (130)
燒木炭.....	牛联棟 (133)
一切为了胜利.....	吕文軒 (140)
外科医生.....	王素孚 (146)
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	吕毓鍾 (156)
編后記.....	(183)

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

賀 誠

人類歷史無數次的證明，任何一個反動統治階級都不會自動地退出歷史舞台；人類歷史也同樣的證明，任何一個被壓迫階級如果不採用武裝鬥爭，是很難奪取政權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起，開始了更有組織的更大規模的武裝鬥爭。

工人、農民以及其他革命分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武裝鬥爭，是在敵人槍炮刺刀屠殺下，用落后的武器和斧頭、鐮刀、扁担、鋤頭開始同敵人搏鬥的。

就武器來說，中國勞動者同當時剝削者比較起來，是力量懸殊的，就戰鬥經驗來說，又何嘗不是懸殊很大；可是就政治因素來說，我們却大大地優越於敵人。我們正是依靠了這個政治力量，由小到大、由弱轉強，一直到把敵人徹底打垮，建立起工人農民自己的政權。

這是一場艱難、殘酷而又是連綿歲月的鬥爭。

在這場武裝鬥爭中，衛生工作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它

随着武装斗争的发生、发展而日益成长、壮大起来。

卫生人员对武装斗争中伤病战士的救治，是从阶级友爱和阶级利益出发的。因此，一开始，卫生事业就是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在当时，不可能先组织好了卫生队伍，再开始组织武装队伍，甚至也常常不是同时组成的。恰恰相反，常常是伤兵抬下来，战士生了病，还没来得及组织好卫生队伍。

医药力量的贫乏，同队伍的不断扩大、战争的日趋频繁，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此，如何组成一支与战争需要相适应的卫生队伍，就成为当时摆在党面前的庄严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昌起义三年半后，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于一九三一年春在江西省兴国县茶岭诞生了。这是党所创办的第一所为中国工农红军直接服务的卫生学校。

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所担负的政治任务，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因此，它的教育方针定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卫生干部”。

这个方针不仅明确地指出了教育的目的，也把政治和技术的位置摆得很适当，并且规定了对政治教育、技术教育的要求。

在实施教育方针中有两条不能逾越的定则：政治上不坚定的人不能入学；政治学习不好，即使技术学得再好，也不能毕业。一句话，教育为政治服务。这是红军卫生学校的特点之一。

战争频繁而残酷，指战员们承受着不可避免的各种恶劣条件的侵袭，物质生活的低劣，结果是伤员和病人日益增多

了。由于每个人的任务和遭遇都基本一样，年龄也差不多，从而伤、病的种类也比较一致。所以，首先同多发的伤、病作斗争，就成为当时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教育工作中使学员能首先学会处理战伤，特别是四肢的战伤，以及学会处理多发病，特别是四种病——瘡疾、潰瘍、痢疾、疥疮，就成为当时技术教育中的最中心問題。当然也并不是只教这几种伤病的防治而没有其他，不过是把它们更多地突出起来，其他则放在较次要的地位。这就是当时所谓“少而精和重点教育”的方针。它使学生在重点的前提下还具有一般的医学知识。

预防医学教育也随着部队卫生运动的开展而开展起来。在卫生学校内办有保健班和卫生员训练班，他们毕业后曾在卫生运动和保健工作中起过骨干作用。

所以红军卫生学校教育的结合实际、重视预防教育、教育为战争服务的旗帜是很鲜明的。这是红军卫生学校的特点之二。

针对着教员少、参考书少、设备少、物质生活困难、学员文化低、时间短等等特点，领导同志、教员、学生一齐动脑动手，同困难作斗争，是思想一致，步调整齐的；苦干、穷干、实干也成为平常的事。把复杂的理论简化、通俗化、形象化，把难记的内容歌词化；教员编讲义，学生刻铜版、搞印刷；白天上课，黄昏文娱，晚间讨论、互助；大家参加耕田队、养鸡鸭队、缝补队、帮厨队等等。一切一切的困难，经过大伙出主意、想办法和

辛勤劳动，便一件一件地克服了，从而使學生既得到政治、技术教育，也得到生活教育，更得到劳动锻炼。所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红军卫生学校的特点之三。

上述这三个特点，对当时创办学校的同志們和學員們說来，是很自然的事，如同日常生活中必須做的事情一样。这正是党的教育、实际生活和殘酷的斗争影响人們思想和行动之深的結果。正是在这三个特点指导下，培养出大批紅色卫生干部，他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今天回忆起来，值得引人深思。依照当年的時間、地点、条件，把它的特點給予正确的估計是必要的。依照今天的時間、地点、条件，把它的特點、精华发揚光大，創造我們今天的历史，更是必要的。

沈阳医学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創办的红军卫生学校的延續。保持和发揚红军卫生学校的优良的革命傳統，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針，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培养大量“政治堅定、技术优良的紅色卫生干部”，就成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了。我相信，新一代的成长，将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貢獻出更为雄偉的力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

（本文作者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

中国工农紅軍卫生学校在瑞金

孙仪之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国工农紅軍卫生学校由江西省兴国县的茶岭鎮迁到瑞金。

瑞金，这个革命根据地的首都，在当时反“圍剿”战争时期，是个比較安全的后方，中央和軍委首脑机关都在这里。卫生学校迁到瑞金后，住在洋崗下，由于离中央机关很近，和得到軍委及总卫生部的直接关心、领导，就比較迅速地发展健全起来了。

卫生学校在茶岭鎮时，我做教育工作。那时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学校各方面设备都比較差。几間教室(民房)，几位教員，几十名学生；没有什么实验室和图书、器材(記得完整的骨骼标本只有一副；少量图书，放在校长房間；讲义是油印的)；沒有一定的学制和确定的教学计划；与紅軍总医院在一起，好象是医院附設的一个訓練班。可是迁到瑞金后，就有了很大的改观。

到瑞金后，傅連璋同志主办的紅色医务学校和紅軍卫生

学校合并起来了，并把洋崗下的医院改为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这样，学校就成了当时最好的一所医学教育机关了。这时，学校已建立了一套教学制度：有了一定的学制和教学计划；划分了基础、临床、实习等教学阶段；规定了教学进度；并添置了一些图书、器材；接办了为教学实习用的附属医院。这比过去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因而教学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据我看，卫生学校在瑞金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健全发展的时期。

医科的学制是一年毕业：五个月学基础课，五个月学临床课，两个月实习。基础课共有六门：解剖、生理、病理、细菌、药物及诊断学。临床课有：内、外、眼、耳鼻喉及妇产、皮花等科，但以内、外科为主，战伤疗法包括在外科内。此外，有必修的政治课。各课的教学时数也有一定的分配比例，如病理学定为五十至六十小时，诊断学定为一百二十小时，内科学定为一百八十小时。每周教学时数是三十六小时；每天上课六小时，复习讨论二小时。每门课程大约上课二十多小时，就要进行一次考试，以笔试为主。教材是教员根据教学计划自编的讲义，讲义大部分用铅印。学校还成立了图书、标本、模型室和细菌检验室。各种标本、模型、挂图，大部分是师生自己动手制作的。有的是部队卫生机关帮助学校搜集的和通过各种关系到白区买来的。这时学校的设备比在茶岭镇时已强多了。图书增加了十多倍，并且还有了显微镜和X光机。

学校的组织机构是这样：在校首长下，设有教务处、政治处、总务处。教务处负责全部教学工作；政治处除负责学生的

政治思想教育外，兼管附屬醫院；總務處主要是管理伙食及日常事務，由總衛生部的總務處兼管。在茶嶺鎮時，校長是彭真同志，政委由王立中同志兼（他當時是總醫院的政委）。後來彭真同志調前方工作，改換陳義厚同志接任校長，直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為止。教員有曾守蓉（教藥物）、李延年（教外科）、俞翰西（教耳鼻喉及皮花科）、李治（教解剖、生理、細菌）、孫儀之（教內科、診斷、病理）等。臨床各課的教員也兼任附屬醫院各科的醫生。

學生的組織，按招生先後分期，如第一期、第二期等，期下分班。每班有班長和學習小組長，以後又由學生中選派各門課的課代表，負責與教員聯繫及反映學習上的疑難問題及意見。復習討論時為集體學習，互相幫助，教員分別到各班進行輔導。到瑞金後，先後又招收第四、五、六、七、八期，同時還亦有調劑班、衛生員班等。由於學生增加，班次增多，分編為兩個大隊。第一大隊是醫科各期，除畢業離校外，當時在校的有四、五個期，每期四、五十名至五、六十名不等，共約有二、三百名左右。第二大隊是衛生員（長）訓練班、調劑訓練班，最多時也有學生二百多人。一大隊與校部、附屬醫院都住在洋崗下，二大隊分住在相距不遠的朱坊。

附屬醫院，在院首長下設有醫務、管理兩科。政治處由衛生學校政治處兼管。病房，大約可容三百名患者。技術設備條件在那時中央蘇區來說算是好的，成為當時技術比較高的醫院。有手術室、藥房和檢驗室。手術室是改建的，房頂用玻璃圍窗，便於學生觀看學習。手術器械也相當完備。後來

还有了一架X光机。那时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央首长，有病时也在这个医院治疗。

紅軍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在当时成为中央苏区的一个医疗技术中心，名望很高。各軍团的死亡診斷书还送来学校审查。学校还办有紅色卫生刊物，指导紅軍的医疗卫生工作。

当然，从现在的水平看，那时的紅軍卫生学校，不論在教学或医疗工作上，都还比較差。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战争环境，农村条件，受敌人封鎖包圍，物質困难）能办到这样，已經很不容易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紅色卫生干部为革命战争服务是这所学校一个很大的貢獻。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紅軍卫生学校的光荣傳統，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繼承、发揚的。

第一，是教育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在当时“圍剿”与反“圍剿”的尖銳斗争中，大家真是意志坚强，思想明确：学生毕了业就上前方为战争服务。教員为这个目的而教，学生也为这个目的而学。由于战争需要大量的医务干部，于是就采取了一年短期速成的学制，而課程又确定以内、外科为主。講課力求簡明适用，課程有重点，教学有中心。教員钻研教学，在学生学习討論时进行輔導。学生勤学苦练，虽然工农分子文化低，但是能努力自修，发揚階級友爱，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工作人員也都能忘我地自觉地工作。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政治上坚定，也确有比較好的技术水平，基本上适应了战争的需要。在那时很少有單純技术观点、个人名利思想，每个人都在为又紅又专而奋斗。

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星期六都有义务劳动，全体学生都去帮助红军家属种田、打柴、挑水；学校里也有副业劳动生产。一切校内劳动都是学生自己干，以劳动为荣，以偷安落后、消极怠工为耻，成了当时普遍的风气。

第三，实行培养工农干部的阶级路线。学生都是工农分子，很多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卫生员、战士。这些人都是政治坚定、思想纯洁的青年。他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革命，从不计较工作，也不计较待遇，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也有艰苦学习的精神。由于学校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能经得起严重的考验。他们在激烈的战争中无比的坚定、勇敢，不仅能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工作，而且在学术上还不断地求得进步。应当说，这些学生都是革命卫生工作中的基本骨干，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成为国家和军队卫生工作的领导干部了。

第四，艰苦朴素的作风。学生没有津贴费，也没有什么一定的供给标准，发什么穿什么，有什么吃什么。没有鞋穿，就自己做草鞋；没有笔记本，就自己用纸订；没有铅笔，更没有自来水笔，就用小竹管削尖了，当做笔，蘸水写，写钝了削削再用。用木板一搭就成了同学们的课桌，用一块大门板（或者再在那上面用黑油刷一下）挂起来就是黑板。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做的一个小板凳，在室外上课时，坐在小板凳上，双膝一屈，平放胸前，也就成为“桌子”了，放书、写字全靠这张“桌子”。房子是民房或祠堂。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等物质条件虽然是这样，但是却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为此而计较；相反，都是

乐观地积极地刻苦钻研、努力学习，甚至在长征的路上，还是边走、边教、边学。

第五，对待旧技术人员，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与李延年、俞翰西等几个人本来是国民党军队里的，解放过来后就到卫生学校教书，受到党的优待照顾，每月给六十元现金津贴费。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的熏陶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中，渐渐地认识了革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之所以能为革命事业做点工作，主要是由于党贯彻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结果。

红军卫生学校在瑞金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培养出大批的优秀的红色卫生干部，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的结果。党不仅规定了明确的英明的教育方针，而且还通过各方面力量，躲过蒋介石的“封锁”，为学校搞了许多图书、器材、仪器。例如X光机，就是这样买到的。学校的党、团组织生活也非常活跃，对保证教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显然，没有党的领导，学校的一切都将不堪设想。此外，学校领导同志，能够率先垂范，以自己坚定的立场、朴素的作风、刻苦钻研的精神去影响别人，对办好学校也起了很大作用。在这里应该纪念的是：已为革命牺牲的两位校长。他们的音容笑貌、优良作风，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彭真校长，四川人，当时三十多岁，作风上艰苦朴素，热诚和蔼，身体不好也能带头坚持工作，在长征中走到四川的宝兴县城遭到敌机轰炸，不幸牺牲了。陈义厚校长，河南人，当时四十多岁，为人诚恳热情，能克己待人，很有办学经验，对学校的建设曾起了很大作用。红军长

征他被留在苏区，不久也牺牲了。

紅軍卫生学校这些优良的革命傳統，在当时，保证了学校健康地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在今天，为了使学校办得更好，这些傳統不仅应当很好地繼承，而且应当很好地发揚。

（本文作者系紅軍卫生学校教員、教育长）

在紅軍卫生学校第一期

張汝光

正当紅三軍九师从零都到达瑞金，准备过了年向福建进军的时候，有一天，軍医处医生孟謙同志告訴我，領導上已決定調我去紅軍卫生学校学习。那时，我才十七岁，在軍医处当看护。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但稍一考虑，却又半信半疑了。我想：“紅軍天天行軍打仗，怎么能建立学校呢？大概是孟医生和我开玩笑吧！”隔一会儿，我又反駁自己：“紅軍已經扩大到五、六个軍了，卫生人員很少，解放过来的卫生人員也不多，我們軍医处只有三个医生，一打仗就忙不过来，有些伤口就靠貼膏藥来治，眼看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受痛苦，不培养更多的医生怎么行呢！”那时，我对紅色医生有一种崇敬而又神秘的看法，总觉得無論在政治上或在技术上，紅色医生的水平总是高不可攀的。因此才認為：“自己年齡小，文化程度低，即使抽調學員也輪不到我頭上來。”直到軍医处蕭政委到宿舍來，証實了孟謙同志的話以后，才結束了我的种种猜測。

当时，我的心里涌着要去完成一件了不起的任务时所特

有的高兴和激动，但也怕去了考不上，辜负了上级的期望，回部队来被人笑话。我怀着这种心情，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和师里其他几个同志到瑞金总卫生部去报到了。几天以后，我们又迁到零都。参加考试的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有医生、队长、战士、通信员、文书、看护员等；年龄从十六岁到三十岁，还有十多个女同志。

考试后第四天就发榜了。由于参加考试的人文化程度很低，只录取了正式生十九名（内有一名女同志）、旁听生六名（内有三名女同志）。

学校设在一个空祠堂里。我们忙着准备开学：进行清洁整顿，把墙上的灰尘和蜘蛛网弄干净；向老乡借来的桌子凳子有长的也有方的，我们想尽办法把它们摆得整齐一些。我们兴致勃勃地劳动着，心里似乎都在说：“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始学习啦！”

一月十五日，早饭后，我们怀着异常愉快的心情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教室没有什么布置，甚至连红绿纸的标语也没有。从陈设上看不出一点喜庆节日的样子；但从同学们的脸上，却可以看到那种既庄严又兴奋的神情，连那个年龄和我相仿，在什么地方也难安安静静地呆上五分钟的小鬼，也端端正正地象个大人似的，坐在我的旁边。开学典礼开始了，贺诚兼校长报告了学校成立的经过，并勉励大家努力学习，然后由教育长陈志方同志宣布教学计划和学校的规定，并把全校的教员（两位业务教员，一位政治教员）给大家作了介绍，最后由学生代表讲话，总共只用一个多钟头。